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归宿

吴 恒

本文回顾了我国民族学学科的积累、形成和发展历程，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建立发展的过程。上下三千四百多年浩繁的书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情况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时期；1926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逐渐开展，建国以来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中国民族学体系逐渐形成，但仍需不断建设和完善。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民族学工作者一项历史性的使命。这既光荣又艰巨的工作，不仅富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做好这一项工作，必定会大大地推动我国民族学的科学研究，使之在新的历史阶段大放异彩，而且对于我国，特别是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事业，也会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拟结合我国历史和现状，探讨一下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必然的归宿。

一

我国同西方国家一样，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以前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民族学资料积累阶段。这是由于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浩瀚的史籍中给我们留下许多关于民族的记录。最早的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周时期。殷商的甲骨文、两周的钟鼎铭文和先秦时期的诸子典籍包括《尚书》在内，都留下一些有关民族活动的简单记载，秦汉时期开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其后的发展，促使为数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纳入祖国的版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两汉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适应历史客观发展的需要，在他所撰写的《史记》一书中，替一些少数民族撰写了传记，这是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相沿，转相承袭。一部《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以外，都有民族传记，《清史稿》也不例外。这样以来，我国历史上溯商周，下迄清代，古今上下三千四百多年都有少数民族的记载可寻。

以后，由于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记述边疆各族的著作与日俱增。很多到过边疆的官吏、使节、游历者和和谪徙者，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写成笔记、游记之类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汉·赵焜《吴越春秋》、杨终《哀牢传》、佚名《永昌郡传》；

晋·常璩《华阳国志》；唐·樊绰《蛮书》、刘元鼎《使吐蕃记》；宋·米蔡隆礼《契丹国志》，洪皓《松漠纪闻》，彭大雅、徐皓《黑鞑事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辅《溪蛮丛笑》，周去非《岭外代答》；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契风俗》；明·陈诚、李暹《西域蕃国志》，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田汝成《行边纪闻》；清·椿园《西域闻见录》，何秋涛《朔方备乘》，余庆远《维西见闻记》等等。其它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应该指出，这些著述虽然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学专著，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我国边疆各民族居室、饮食、服饰、婚姻、家庭、节日、丧葬、宗教、巫术、鸡骨卜等情况，这些都是各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纪录。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著述的内容难免有附会、歪曲的地方，但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检验，这些内容丰富的著述仍然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学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总之，这一切只能看做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阶段。

二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以世界为范围，纷纷争夺殖民地。例如英国：1800年夺取马耳他岛，1806年夺取开普，开始了对南非的统治，1838年，英土条约，使英国资本主义广泛渗入阿拉伯国家，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使香港变为殖民地，与此同时加强对印度的全面奴役和对澳洲殖民地化的加强。又如法国：1830年—1848年征服阿尔及尔。1842年，夺取波利尼西亚许多群岛。1853年，夺取新卡列多尼亚。1858—1867年夺取越安。又如美国：1803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路易斯安那。在19世纪上半叶，对密西西比以西土地展开进攻，把印第安部落排挤驱逐出去，将他们迁入保留地。1848年，在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中，取得了西部大片领土。

西方民族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英国民族学创始人之一约翰·卢伯克在其《文明的开端》一书中说：“研究野蛮的生活，对英国特别重要，因为她是一个大国，她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一语道破了西方民族学的阶级属性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进化学派，主张各民族都有独立创造发明的能力，主张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大致都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单线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需要，西方民族学掀起一股反进化论的浪潮，相继出现了传播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以反进化论起家的学派。传播学派，包括德奥文化圈学派，主张不同地区人类文化的相同现象是从一个最早中心传播出去的结果。美国“历史学派”认为，文化现象仅仅有空间上的不同，而没有时间上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主张历史仅仅是研究和描写具体的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功能学派”，主张研究文化的功能，认为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才能存留和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由于此派适应美、英等国的需要，至今仍很盛行。此外还有“心理学派”主张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它的文化模式具有密切关系，文化模式是民族性格的反映，

而文化模式是有高低之分，因此，此派又被称为“心理种族学派”。

总之上述诸学派中，“进化论派”的摩尔根通过他对于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实地调查，建立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体系，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恩格斯认为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是“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此派其他学者如泰勒对宗教的研究，巴霍芬、麦克伦南对婚姻家庭的研究，也都很有成绩。恩格斯说巴霍芬是“研究家庭史和原始婚姻——杂交的第一人”。

其他诸学派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反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普遍规律，因而轻视历史，反对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入侵的同时，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也相继传入中国。其代表性著作如摩尔根《古代社会》、泰勒《人类学》、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韦士勒《社会人类学概论》、罗维《初民社会》、傅瑞则《巫术理论》、格罗塞《艺术的起源》、鲍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以及马凌诺斯基《文化论》等等，都相继被译成汉文出版，这给解放前中国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为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1926年，“民族学”这个学科名称在中国开始出现蔡元培撰写《说民族学》等文，对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都作了阐述。他说：“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纪录或比较的学问”。1928年—1940年，蔡氏出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民族学组，蔡氏自兼主任。蔡氏不仅积极宣传进化学派的理论学说，而且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并派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凌纯声、芮逸夫、刘咸、陶云逵等民族学家相继到瑶族、高山族、赫哲族、苗族、畲族、黎族、彝族等地区调查，写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其后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全国一些大学陆续迁到西南地区，大批学者云集西南各地。西南各民族瑰丽多彩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引起了包括民族学在内各学科学者的广泛注意。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这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民族学著作和论文，成绩不能低估。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政府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汉族，其他的只是汉族的宗支，或是生活、饮食不同习惯的人。在这种错误的民族观的指引下，当然不能正确指导民族学研究。加以马克思主义在蒋管区受到扼制和封锁，从而使得许多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中，横的描述多，纵的分析少，现象罗列多，科学概括少。不搞经济基础的研究和阶级分析这是解放前民族学研究的通病。

四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向重视民族调查研究工作。早在建党初

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国内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十分重视搜集沿途民族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民族学院和专门从事民族研究，撰写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民族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民族学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积极参与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并参与进行了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五种民族丛书（民族简史、民族语言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等工作。这些都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伟大的事业，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为世界、为我国、为子孙后代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我国民族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和机构。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一些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关系、中央民族学院设立民族学系、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学系等；出版民族学刊物如《民族学研究》；出版各种民族学专著，如《原始社会史》、《纳西族母系家庭》、《凉山奴隶制度》等；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和民族卷及《民族词典》，等等。这一切都反映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五

通过中国与外国、中国解放前与解放后民族学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的国情和民族研究的传统，既不同于西欧美国等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国家，也不同于亚、非、拉的第三世界，甚至与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样。因此，在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时，我们绝对不可以全盘生搬硬套别国经验和做法，而是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的国情和民族的实际，就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四化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加以研究与解决。我们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的研究，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必须公开揭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服务，要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因而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必然归宿。我们对西方民族学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种族主义理论观点应该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对其具体的调查方法可以借鉴，其调查成果则可以利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民族学体系就是在这样长时期民族学研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在长期的民族学研究实践中，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概括、升华而逐步形成的。

六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建立发展的过程。这是中国民族学体系从19世纪末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后，经过解放前后近100年的实践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各民族实际，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和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在指导思想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它与西方民族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在民族学定义、对象、范围、任务和方法方面，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研究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合、部族在内的一切人们共同体）的独立学科。纵的方面，它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及其规律；横的方面，它研究各民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文化特点、生活习俗，研究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变迁的规律。民族学可以研究古今民族，但以现存的民族为主；可以研究中外民族，但以中国民族为主；可以研究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但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因为在解放前夕，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解放后，少数民族的政治上翻身作主，但在经济、文化方面还存在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为了用“社会活化石”资料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为了在四化过程中消除事实上不平等，所以在当前及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少数民族身上，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臆造的。

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方面，西方民族学着重于横断面的实地调查，忽视历史发展的分析。他们采用“田野工作法”、“比较研究法”、“具体描述法”、“直接观察法”、“住居体验法”以及“局内观察法”等等，并非毫无价值。资产阶级民族学便是通过这些方法，为民族学研究留下相当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但是这些调查法如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角度来检验，不难发现这些调查方法都存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停留在“直接观察”亦即“直接感知”的阶段，用这些方法来观察客观事物，都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和表面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仅仅运用这些方法而不借助其它科学方法的配合，要取得对客观事物全面、深入、本质的了解，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关于中国民族学当前任务的问题，不少同志已经提出很多很多的意见，例如：大力抢救行将消失的民族学资料，充分利用已有的民族学资料；继续进行现状的调查，撰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专著；建立全国民族学博物馆；开展对世界民族和外国民族学的研究；翻译民族学各学派的代表性著作；继续摄制反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的科学纪录影片等等，无疑地都是非常正确的，应视条件与可能把它们付诸实现。我们在这里只想补充说明一点，即我国各民族历史背景不同，情况复杂，在四化建设中所碰到的重要问题也不一定都一样。所以在进行现状调查中，不能一刀切，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生产成倍增长。但与此同

时，一些旧的生活习俗又有所抬头，例如酗酒、迷信、婚丧大量杀牲送鬼宴客，造成了经济上巨大浪费，削弱了再生产的潜力，因而也就拖了四化建设的后腿。当然除凉山彝族外，其他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此在民族学研究中，各民族的传统与四化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又如：在海南岛黎族中，在建立海南省撤消黎族苗族自治州建制后，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是广大黎族干部和群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反应特别强烈。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研究与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培养后继人才。各高等院校和各级民族学院应该开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课程，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培养研究生。此外还可以举办短期训练班，招收有一定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短期的民族学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多方位、多层次、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以壮大民族学的研究队伍。

总之，在向四化宏伟目标进军的征途中，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有无比宽阔的前景。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努力开展对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综合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为中国民族学乃至世界民族学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学院)

[责任编辑：杜松]

(上接第43页)

灭它的光辉，这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终将凋落它的艳容。可是《周易》的发展前景却不会这样，只要我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就可从中汲取上进的力量。它的非宗教倾向、它积极入世的务实精神总是启示人们：

“要不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伸手摘取人间的真实花朵！”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 《中国哲学》第三辑（第1—12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204页。

⑤ 《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

⑥ 《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⑦ 关于中国的历史分期，说法不一。我完全赞同范文澜的分法，即殷周之际是由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而春秋战国，则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

(作者单位：云南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樊坚]